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14

网络青年滥用“老师”称谓现象的辩证审视

吴钊, 周君成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社交媒介时代,“老师”不再是师者的特定指代,而成为社交场域中一种具有娱乐化偏向和社交参与号召力的文化模因。网络青年视其为社会交往中关系破冰、圈群辨认、认可表达、流量洞察的重要手段,这种行为表面上是狂欢闹剧,实际上隐含了他们对理想交往语境、理想交往对象、理想交往自我和理想社会认同的深切期待。为避免沉溺于网络社交泡沫和关系假象之中,网络青年应当通过平衡“利益-意义”的价值取向、明晰“网络-现实”的使用边界、强化“主体-群体”的自我意识,来避免自身沦为情绪至上、娱乐至上、流量至上的数字个体。

关键词: “老师”;网络青年;网络社交;称谓滥用;使用动机;交往心理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113-08

Dialec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Youth Abusing the Title of “Teacher”

WU Zhao, ZHOU Jun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teacher” is no longer a specific reference for teachers, but has become a subculture symbol with entertainment bia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ppeal in the social field. Internet youth regard i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breaking the ic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identifying groups, recognizing expressions, and gauging online influence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This behavior may seem like a carnival farce on the surface, but in reality, it implies their deep expectations for the ide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ideal communication partner, ideal communication self, and ideal social identity. In order to avoid indulging in the network social foam and relationship illusion, internet youth should avoid becoming a digital individual with emotion first, entertainment first and flow first by balanc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interest-meaning”, clarifying the use boundary of “network-real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lf-awareness of “subject-group”.

Keywords: “teacher”; internet youth; online social communication; abusing the title of “teacher”; motivation for us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teraction

人类社会网络媒介化进程步步加速,新一代青年群体的认知和行为正在被各类视频号、直播号

及营销号的低俗无良内容所影响。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日常规范用语频繁被戏谑式解构,极速引

收稿日期: 2025-12-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交网络中主流文化传播失范与‘圈层’干预研究”(20CXW001)

作者简介: 吴钊,男,湖南汨罗人,湘潭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网络流行文化传播。

发青年网民的狂欢扩散,形成蔚为壮观的媒介景象。我们对青年网络流行文化实践不宜轻易否定,但对有违公序良俗的失格行为也不应听之任之。譬如面对“老师”这一严肃称谓,一部分青年网民似乎已将其原本的身份意义抛之脑后,而把它的使用当作一种万能的社交法则。主播间的商业互捧、同好间的身份互认、恋人间的亲密互示,皆以“老师”相称,仿佛“人人皆为老师”。一时间,网络上“老师”的称谓泛滥。

所谓滥用,是指没有选择地、过度地、混乱地使用。“老师”称谓从传统使用、现代泛化使用到被网络滥用,社交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依据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的“选择性聚神”理论,处在社交媒介中的人们会短暂脱离社会控制(这里可理解为传统言语交际规范),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产生“非习俗性的新颖行为模式、流行时尚与自由幻想”,以彰显自我存在、达到自我取悦的目的^[1]。青年网民不顾传统言语交际规范,凭个人喜好和网络社交需要,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老师”的指称范畴,不仅造成了指称混乱、情境杂糅,更从根本上消解了“老师”称谓原有的专业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其对真正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害。譬如,网红“迷人的郭老师”在直播中以极度丑陋的行为简单粗暴地刺激人的感官,无限拉低网友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而部分网友却将“郭老师”那些毫无营养的文化和价值输出荒诞地定义为“郭学”,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巨大的审丑狂欢之中。诸如此类的滥用情形在社交媒体中屡见不鲜,正以病毒扩散般的速度侵蚀着青年群体对“老师”既定内核和职业形象的认知,且其影响已扩展至现实情境中。

“老师”这一称谓不再是师者的特定指代,已然演变为社交场域中一种具有娱乐化偏向和社交参与号召力的文化模因。青年网民为何执着于此?这种行为体现了当代青年怎样的交往心理期待?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态看待青年流行文化实践?如果按照以往研究者习惯性遵循的“问题化叙事”模式^[2],我们大概又会站在主流阶层的视角,为青年群体预设亚文化视野中的“越轨”标签,揭露青年认知混沌之原罪。不过,这种模式始终无法解释现象发生的根源。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一种媒介会为社会带来一种特定的认识论和感知方式”^[3],那么当代青年的认知混沌是否源自网络媒介为他们创造的“独特”感受与“独属”经验?基于这些疑问,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了解相关参与者的投入行为和切身感受,以探明网络青年滥用“老师”称谓的主观动因、心理期待以及个中隐含的媒介动员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 平台漫游

研究初始阶段,笔者以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为主要漫游平台,重点关注青年群体在网络直播和评论互动中使用“老师”称谓的行为和表现。通过为期半年的参与式观察,笔者有几个初步发现:(1)“老师”称谓女性使用者多于男性。无论在日常人际交往还是特定圈层的交流中,女性对于“老师”称谓泛化义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频率都普遍高于男性。(2)多数使用者有过“混圈”经历,如二次元圈、汉服圈、娃圈等,在圈群生活与角色扮演中,称呼他人或互称为“老师”已成为圈内问候、示好的常用方式;同时“老师”也作为打开圈群大门的社交钥匙被越来越多的网络青年熟知与使用。(3)网络使用行为和网络观看行为均会对线下使用行为产生涵化作用。当脱离网络社交场域后,这种使用习惯依然会伴随他们进入现实社会,完成从线上到线下的社交文化迁移。(4)由于网络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老师”称谓滥用现象呈现出向青年群体外扩张的明显趋势。这些发现激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滥用“老师”称谓现象背后的群体心理特征和深层意义指向。

(二) 深度访谈

在形成对网络滥用“老师”称谓现象的初步认知后,笔者借助微博、小红书平台发布了有偿招募访谈对象的公告,彼时,共有52名网友表明了参与访谈的意向。通过问卷遴选方式,笔者共选定了17名访谈对象。问卷涵盖的问题包括年龄(要求18~35岁)、性别、职业/身份、社交平台使用频率、网络话题互动参与积极性、网络流行文化了解程度、网络流行文化实践程度等。女性受访者依次编号为F-1至F-10,男性受访者依次编号为M-1至M-7,其中F-10、M-6、M-7用于饱和度检测。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性别	身份/行业	入圈情况	常用社交平台	“老师”称谓使用情况	
						网络使用	线下使用
F-1	18	女	本科在读学生	汉服圈	小红书、微博、微信	是	是
F-2	33	女	互联网企业职工/网络主播	未入圈	B站、小红书、微信	是	否
F-3	27	女	事业单位职员	国产动画番剧圈	B站、抖音、微博、微信	是	是
F-4	23	女	硕士在读学生/网络主播	手作圈、娃圈	小红书、微博、微信、QQ	是	是
F-5	18	女	高中生	COS圈、娃圈	小红书、微信	是	否
F-6	22	女	自媒体人	同人圈	小红书、抖音、豆瓣、微信	是	是
F-7	24	女	媒体见习生	未入圈	小红书、微博、微信	否	是
F-8	25	女	电商企业职工	未入圈	抖音、微信	是	是
F-9	25	女	互联网企业职工	游戏圈	抖音、微博、微信	是	否
F-10	28	女	电商企业职工	饭圈	小红书、微博、微信	是	是
M-1	23	男	电商企业职工	电竞圈	小红书、微信	否	否
M-2	23	男	硕士在读学生	日漫圈	B站、小红书、微信、QQ	是	否
M-3	19	男	本科在读学生	未入圈	小红书、抖音、微信	否	是
M-4	32	男	大学老师/网络主播	未入圈	抖音、微信	是	否
M-5	28	男	文化科技企业职工	游戏圈	微博、微信	否	否
M-6	30	男	出版社职员	游戏圈	抖音、微博、微信	是	否
M-7	25	男	硕士在读学生	电竞圈	微博、微信	是	是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获得研究所需资料。根据每位访谈对象的时空条件, 灵活采取面对面或线上语音对话的形式完成访谈任务。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 35~45 分钟, 部分访谈对象接受过二次访谈, 共获得 6 万余字的访谈记录。本研究采取文本分析法对所得访谈资料进行整理、挖掘和提炼, 并从中精选部分能够突出反映青年群体心理动机、情感态度、价值立场、行动逻辑的文本作为后文讨论的支撑。

二、“老师”遍在：网络青年的社交意义追逐

媒介化理论认为, 媒介以一种结构性力量发挥着对社会的强大规定性^{[4][72]}。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媒介的“规定性”作用下, 社会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脱域”偏向。社交媒介技术促使人们逐渐解除彼此面对面互动的地域性关联, 进入由不确定时间和不确定对象主宰的社交场域, 完成社会关系的重组实践。这一变化在言语交际中也有充分体现。面对面言语交际中, 称谓使用的基本原则是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等差原则讲究“尊卑贵贱、长幼差序”, 体现“身份规定性”; 情感原则讲究“亲疏远近、关系情分”, 体现“关系融洽度”^[5]。“老师”这一称谓

兼顾了两大原则, 表明了中国人尊师重教、求学求雅、疏离政治的传统文化心理取向, 可谓称谓使用的理想境界。相形之下, 网络青年对“老师”称谓的滥用脱离了这一规则框架, 掉入了网络媒介型构的社交意义空间“陷阱”。

(一) 关系破冰：拉近交往距离

人际交往中, 称谓是人与人之间快速建立联系的有效工具。素未谋面的人们在林林总总的网络环境中碰面, 需要一个安全的“过渡性”称谓来掩饰尴尬、打破僵局, 避免阻断彼此交流、发展关系的可能性, 俗称“破冰”。关系破冰期的称谓使用锚定两个目标: 一是消除侵犯性, 不让对方感受到对话压力; 二是均衡声量, 双方处在平等语态下开启对话。在大众认知里, “老师”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正向意义的称谓, 使用者常借此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认可或者排解困难的请求, 其能很好地充当过渡性称谓的角色。受访者表示: “谁都不会拒绝别人的尊重。”(F-3) “被叫老师时, 一般会回赠一个, 互相尊重能拉近彼此的关系。”(F-6) “被叫老师的感觉很美妙, 它有一种情绪价值。”(F-8) “称别人为老师时, 通常都会收到好的反馈。”(M-4) 在网络陌生人交际中, 网络青年把“相互尊重”作为拉近彼此关系的主要技巧, 从这个层面看, 其仍然保留了“老

师”称谓原本的精神内核,这是令人乐观的。不容乐观的是,当谈及自身使用习惯时,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互称“老师”似乎成了陌生人关系破冰的“唯一解”。也就是说,个体自我的想法在社交媒介渲染的“流行”氛围下逐渐向主流意见接近,网络青年的世界观被建构了。尽管“媒介建构现实”已成传播学界共识,但是始终无法想象的是,如果当代青年都以网络的方式理解和行动,并沉溺于网络社交泡沫和关系假象之中,这个世界将变得混沌不堪。客观地说,使用“老师”称谓能发挥交流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二) 圈群辨认: 体认数字亲密

基于共同兴趣和共同价值观形成的网络圈群已成为当代网络青年认识与感知世界的主要途径。在网络圈群文化实践中,青年网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抽象信号,帮助他们轻而易举地辨认相同圈群的成员,形成虚拟共在的情感和身份共鸣。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将这种现象称为“元交际”^[6]。任何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本都可以成为元交际因子,不论是一个表情包、一句网络流行语,抑或一个称谓。访谈发现,除了作为关系破冰期的交际手段,“老师”称谓还化身成为一种元交际因子,广泛存在于同人、COS、游戏、电竞、手作、汉服等圈群的成员互动之中。借助“老师”这一语言符号,圈群同频者可以精准感知身份关联,达成一种瞬时共在感,从而开启一个更高效的互动情境。如受访者所说:“混不混圈、混哪个圈,一开口就知道。”(F-2)“‘老师’表明圈内身份。”(F-5)“一般只和圈内人聊,有得聊,不费劲。”(M-1)高效互动的动力在于它能快速转化为亲密关系,满足网络青年在圈群交往中的亲密期待。身处加速社会,人们越来越缺乏足够的时间去维系人际关系,正如有论者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个体化也日趋分离的世界,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不断强化的社会流动性和‘首属关系’的不断瓦解,都以结构性的方式催生个体化与孤独感”^[41]⁷⁴。在如此社会,亲密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失而难得的稀缺资本。圈群式交往为网络青年们创设了“拟态化亲密”和“想象式互动”的关系建构机制,使得个体在互动参与的过程中也能产生“类亲密”情感的蔓延和交

换。由此可见,“老师”称谓不仅能发挥元交际因子的作用,还能通过对原本身份含义的强调为使用者营造一种“类师生”关系的拟态亲密氛围,促进圈群联结的纽带由共同兴趣演变为共同经验和共同情感,推动着新的媒介文化的出场。

(三) 认可表达: 加强情感联结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指出,人性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7]。我们深知,肯于认可他人,同样也会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积极表达对他人认可被认为是人际交往中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认可表达源于两种情形:一种是对特定对象素质或能力的真正认可,另一种是以鼓励或调侃为目的的认可。一般认为,认可表达发生于熟人或具有一定了解基础的人群之中,陌生人或没有了解基础的人之间则较少发生。然而在圈群交往中,即便是陌生人之间也不吝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和认可,称呼对方为“老师”就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一些领域,“老师”已成为有能力者的专用称谓,比如同人圈称画同人图、写同人小说的人为“老师”或“太太”,COS委托圈称COSER扮演者为“委托老师”。另外,在具体的社交场合中,“老师”称谓充当了人际黏合剂的角色。F-1在谈到自己参加汉服交流展的经历时说道:“有些确实是精心打扮,制式方面也很讲究,称她为‘老师’不为过。特别是想与她合照时,称她老师更容易达到目的。”对此,M-2也表示:“‘老师’带有尊敬之意,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时又不显生硬,非常适合在漫展这类活动中使用。”从认可表达维度上看,尽管今天“老师”称谓的语用环境和使用者的语言行为发生了变化,但其代表的身份意涵始终是清晰和鲜明的。作为尊敬和认可的特殊表达,“老师”称谓的泛化,恰恰印证了它所代表的群体在人们心中的稳固地位。如此一来,网络青年利用“老师”称谓加强情感联结的行为也有了合法性解释。

(四) 流量洞察: 共赴网络狂欢

消费文化、粉丝经济以及短视频、网络直播平台席卷之下,“趋流”彻底成为网络用户生存的基本逻辑。从实体经济时代到互联网经济时代,决定流量的关键变量发生了从空间、品牌、平台到关系的四次迭代。如今,空间布设和品牌背书已经成为过去,平台流量霸权也正逐渐被以强关

系为中心的自媒体所取代。换言之, 流量就等于强关系。自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强关系依赖于信任、共情和心动而建立, 最终物化表现为用户的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我们看到, 网络主播自称“老师”、直播间互称“老师”、粉丝称主播为“老师”的现象引发网络效仿并演化为一种群体无意识行为, “老师”称谓被塑造成了关系流量密码。再以“迷人的郭老师”为例, 她凭借独特的说话风格(如把“猕猴桃”说成“迷 hotel”)被奉为“郭老师”, 粉丝们更在网络上成立“郭门”, 集体钻研“郭学”。主播和粉丝利用“老师”标签建立“类师生”关系, 通过称谓强调、风格共学等情感劳动合力建构主播的领袖身份, 不仅增强了主播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纽带, 也促进了粉丝从个体自我向群体共我的转变。当粉丝对主播的拟态亲密情感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会出现拟态亲密情感的商品化, 即情感消费, 如向主播投送礼物、购买主播带货的货品等。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对流量的洞察和对关系的理解逐渐与群体认知相契合, 最终共同演绎为一场从情感劳动到情感消费的网络狂欢盛宴。

三、以“老师”之名: 网络青年的交往心理映射

从交往发生的过程来看, “老师”称谓作为一种语言媒介符号在网络青年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对话协商作用。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性观启示我们进一步领会网络青年狂欢行为的特殊意味。访谈发现, 网络青年以“老师”之名投入的流行文化实践, 表面上是无聊的闹剧, 实际上隐含了他们对理想交往语境、理想交往对象、理想交往自我和理想社会认同的深切期待。

(一) 理想交往语境: 意义可扩展的低张力会话

语言交际是一个从认知到推理的过程, 其起点是交际双方对交际语境的体认。只有当双方的语境认知趋于一致时, 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语言学者赋予了语境丰富的范畴和内涵, 譬如语义学意义上的“情境语境”、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语境”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辞语境”^{[8]54}。语境分析的多元视角为理解网络青年滥用“老师”称谓现象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据此,

我们从语境的制约、解释和调适三大功能出发, 结合访谈, 发现网络青年对交往语境的期待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无等级差别、无原生关系压力。人际交往的第一要义是场合意识。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场合”作为情景语境的重要构成要素, 特别强调场合对交往参与者话语方式的制约作用^[9]。以师生交往为例: 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是, 许多学生称呼老师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称老师, 背后却称其为“老板”“某哥”或“某爸”, 这种变称就充分体现了场合的制约作用。中国人血脉相传的尊师传统导致老师对学生构成了明显的身份压力, 因而当面表现得非常恭敬, 背后却变换称呼是因为交往场合发生了改变。在此维度上, 可以将网络青年滥用“老师”称谓行为理解为交往参与者的“主体性”宣告, 即通过拓展使用场合, 消释“老师”称谓在常规使用中所隐含的等级关系, 让无等级差别、无身份压力的非常规交往场合“常规化”。其次是无文化鸿沟。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语境具有解释功能。圈群化网络社交追求说话者与言说对象的不言而喻, 这需要通过背景信息、前言后语、元交际信号等语境要素来体认文化的通则性和特殊性。受访者 F-9 表示: “我们使用老师称谓的目的并不是要挑战老师的身份权威,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种行为失格, 那只能说明我们之间有代沟了。”再者是模糊暧昧。系统功能语言学意义上的语境分析“放弃了对语言意义的关注”, 转向关注“不同社会环境下语言形式的功能差异”^{[8]54}。从这个角度看, “老师”称谓作为一种具有网络流行意味的修辞格发挥了语境调适作用, 它降低了称谓话语的“清晰度”, 增强了交往双方关系的暧昧性, 有效调适了不确定性交往者之间的对话压力。受访者 M-3 表示: “我已经习惯了用‘老师’来称呼我身边的一些人, 比如称我女朋友为‘韦老师’, 遇到不熟但又得打交道的人刚开始也会称‘某某老师’, 熟人之间听起来亲密, 陌生人之间也不近不远的, 总之挺好用。”

(二) 理想交往对象: 同频的情绪价值提供者

美国心理学家罗兰·米勒(Rowland S. Miller)在《亲密关系》一书中指出: “人与人之间产生吸引力最基本的假设是他人的出现对我们

有奖赏意义。”^[10]访谈发现,青年群体对他人的“奖赏”期待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显而易见的愉悦感。青年群体在社会交往中注重自我感受表达,同时期待被倾听、被理解和被支持,如受访者们所言:“何必在意那么多,我们又没有污蔑老师。”(F-8)“‘老师’称谓能释放一种友好信号,对方听了之后,会更专注于你们的对话。”(M-5)“直播的时候气氛很重要,互称老师、互相贴金,相互提供一些情绪价值。”(F-4)在社会营造的普遍性焦虑和精神内耗困境中,情绪价值已成为青年社交的主要诉求。毋庸置疑,“老师”称谓确切地帮助对话者提升了言辞表达的艺术性,使对话变得生动、友好并具有了情绪色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恋人之间的互称,在“老师”称谓使用实践中,大多数人认为交往对象的“倾听”“对话”属性比“情感”“亲密”属性更重要。其二是共性联结。在米勒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吸引力。当代青年是迈向个体化的一代,“以自我或个体为中心的解构倾向”^[11]促使他们在交往中把效率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然而,受制于熟人社会的黏腻关系,青年群体始终无力摆脱现实周遭的沟通障碍或无效社交问题,其因此转向网络社会寻求更广泛的支持。“我感觉现实中越来越难找到同频的人了。以‘老师’相称,把自己划入特殊的网络圈群,如果是同频的人,自然就能理解。”(F-1)“老师”从原本的称谓意指中脱离,被网络青年赋予特定的情境意义,并在频繁的传播互动中逐渐演变为群体共识、共享的亚文化表征,这是网络青年发起的一场“符号共谋”,更是一场带有娱乐性质的“集体救赎”。

(三)理想交往自我:群体自我替代个体自我

自我也称自我概念、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是谁”的认识^[12]。人的社会化发展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个体自我,即个体对自身内在品质的察觉;另一个是群体自我,即个体对处于特定群体中的自我表现的感受。个体自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发展为群体自我,群体自我将个体自我纳入某种共同的想象中,使个体特征与群体特征统一起来^[13]。可见,个体在交往行动中的价值感不仅来源于个体目标的实现,还来源于群体的认同。网络青年滥用“老师”称谓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我

“网感”和个性张扬品质的体认,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传统的个体意识是建立在群体意识之上的个体意识^[14]。不同的是,当代青年群体意识的来源从传统的亲缘、地缘、业缘等强连带关系群体向网缘弱连带关系群体发生了转变。譬如,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非常规使用‘老师’称谓行为”时,大多数受访者将此界定为网络场域的一种个性表达和社交伎俩;当被追问“使用时会不会顾及原有规范”时,他们表示网络交往不囿于社会传统俗规,而是主要考虑所在圈群的社交宗旨和文化规范。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可以将“老师”称谓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动员作用的共识性交往符号。青年个体以群体的名义参与网络社交活动,共同维护以“老师”称谓使用为中心形成的新的文化规范(可能是身份正义,也可能是流量思维),产生对共享群体文化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称谓使用成为群体情绪共鸣的路径依赖,而个体行动的目标最终也合意为“确认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群体坐标”^[15]。

(四)理想社会认同:重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在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的基础上,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进一步指出,自我认识的社会自我层面,即个体认为别人如何看待自己^[16]。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个体化的社会,但是基于中国社会经验建构的内在自我始终坚信个人生活的意义深深扎根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尽管人们生活的空间已经扩展至网络世界,但这一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与中国个体化进程后“缺乏重新嵌入的机制”^[17]有着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如自由结社、慈善组织、社工机构等正式组织)重新获得归属感,而中国则主要依靠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寻求庇护。因而,个体欲望和权益即便在网络世界得到了释放和保障,但如果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个体行动的道德合法性也无法确立。在“老师”称谓滥用实践中,网络青年通过符号混杂和意义扩展解构传统社会经验认知,并试图在广泛的传播互动中建立弥散联盟、嵌入社会文化系统,将其熔炼为一个时代的独特文化理解。正如受访者F-6所说,

“其实我们明白‘老师’称谓有非常严肃的意味，但网络是开放、有活力的，它赋予了年轻人标新立异的权利。像这种表达，如果只有少数人用，那么社会一定会质疑；如果用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用、现实中也用，社会或许就会慢慢接受我们这种文化”。由此可见，滥用“老师”称谓现象是青年争夺话语权、重拾信心信念的一个缩影，其中蕴含这个群体对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权力结构的期待。

四、网络青年滥用行为的后果审视与应对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基本兑现了不以问题逻辑看青年流行文化现象的想法，但是始终无法回避大规模网络青年滥用行为造成的后果。一方面，这种行为显而易见地造成了对“老师”称谓所指群体权威性、神圣性的消解；另一方面，以此为鉴，当代青年越来越沉溺于自我身份建构和戏谑式解构交织的网络社交泡沫和关系假象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本文着重反思的问题。

（一）后果之思：沦为偏离社会正义和文化真知的数字个体

其一，过分强调情绪价值，成为情绪主义者。可感知的情绪是网络陌生人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互动的重要媒介。在网络亚文化的纵欲之下，原本象征权威神圣的“老师”称谓被重构为情绪价值的符号表征，承担着交往主体间信号传达和互动促进的作用。然而当情绪价值交换成为青年社会交往和探索的规则，他们将会以不同维度呈现出情绪化的思维镜像。访谈发现，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表达了网络社交中“情绪永恒在场”的自我要求，具体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度表达，情绪外泄；另一种是怯于表达，担心自己满足不了他人。两种表现都证实了社交情绪的反噬作用，其往往造成青年情绪内耗、社交效能感低下、社交倦怠等后果。

其二，沉迷于无意义的狂欢，成为娱乐主义者。当人们身处网络洪流时，个体意志难以避免地被群体意志所取代，而群体所相信和追求的未必就是真相和真理，可能是盲从、极端、偏执或是狂热。因而我们看到，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平台营造的狂欢界面上，“老师”称谓的原始含义被逐步瓦解和抛弃，化为短期戏谑、谄媚刺激，为

网络青年提供庸俗、虚幻的满足感。“人人为师、人人布道”，一旦这种无思之谐在网络拥护和消费下演化为一种新的共同文化理解，人们就会陷入无意义的循环之中，最终成为赫胥黎笔下的“死于狂欢的傀儡”。

其三，人的主体性消失，成为流量主义者。说流量是万恶之源或许言之过重，但是在“老师”称谓的使用实践中，让无脑狂欢附上“传道授业”的色彩未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应当警惕的是，以流量生产和评价为导向的话语权威范式正在蚕食社会道德、制度、理性和正义的正当性。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写道：“影响大众想象力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所扩散和传播的方式。”^[18]作为严肃称谓的“老师”沦为群体借以狂欢的噱头和网络亚文化控制的符码，深刻地反映了网络社会个体自我向群体自我发展的异化之势。在流量的操弄之下，网络群体的自我纳入宣告着个体直觉、意识、身体、情感的消逝，个体在网络上的交流、娱乐和意见发表也将成为一种群体无意识行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不禁反思：当褪去流量的外衣，网络世界的个体还能剩下什么？

（二）应对之策：认知矫正与自我调适

首先要平衡“利益-意义”的价值取向。网络青年群体情绪不可控、万物皆娱乐、无下限博流量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于基本价值取向的模糊。自古有“义利之辩”，辩词之下是人的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利益取向，一种是意义取向。唯利是图不可取，唯义是取亦不符合人之天性，义利关系是人类道德、正义、责任与利益、欲望、满足的平衡艺术。当前，以网络为基础缔结的社会是圈群、资源、利益勾兑下的开放组织，是个人目标凌驾于集体目标之上的利益共同体。青年一代应当知晓，没有社会价值兜底的利益取向既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网络空间遍在的“得利时高兴、失利时痛苦”的情绪撒播者就是力证。

其次要明晰“网络-现实”的使用边界。网络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渗透无处不在，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的那个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管辖的独立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在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分辨网络和现实界限的当下，作为青年亚文

化符号的“老师”称谓,在网络空间里当然有其重要的交往意义,但是如果被沿用至现实,它可能就会遭到社会大众的集体“讨伐”。现实中的交往关系更需要通过有实质意义的内容交流来维系,而植根于网络沃土的青年亚文化大多重表演而轻内容,因而青年群体在处理交往关系时,要矫正自我认知,明晰网络话语的使用边界,避免无边界挪用带来的社会价值失序。需强调的是,尽管社交媒体开辟了自由开放的交往空间,但我们仍然呼吁青年群体要以现实社交为重心,注重现实社交关系和现实意义空间的培育。因为一旦现实社交沦为网络社交的附庸,代际、家庭、宗族乃至更广范围群体之间的情感纽带终将断裂,人们将会丧失来自现实社会的支持力量。

再者要强化“主体-群体”的自我意识。网络流行文化实践可能引发表达失序、代际失语、社交失焦等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青年“主体的自我”和“群体的自我”意识的缺失。所谓“主体的自我”意识,是指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意识。数字媒介时代的社会文化生产,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不断凸显,在唤醒新的文化创造力量、培育新的公共文化意涵、促进社会共同理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青年熟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介、跨媒介模态的内容生产,了解互联网流行的米姆因子和米姆的元传播意义,是当今社会自我认知革命和媒介文化生成的最有力推动者。“群体的自我”即社会的自我、人际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的“完整的自我”。根据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兴趣、社会关系等标准,社会人口可划分为规模不一、类型多样的群体,个体倾向于将自我纳入特定群体并试图窥探和接近其他群体。不论作为群体成员还是群体外成员,青年一代都应当紧跟前沿技术,积极创造先进文化,团结群体内外力量,促进社会整体形成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最大化地消除因社会背景、个体经历而造成的认知分歧,营造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理想社交环境。

参考文献:

- [1] 宗益祥. 游戏人、Q方法与传播学: 威廉·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120.
- [2] 王德福. 轻社交与浅缘社会: 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5): 30.
- [3]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7.
- [4] 曾一果, 王敏芝.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视[J]. 探索与争鸣, 2024(1).
- [5] 李树新. 论汉语称谓的两大原则[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78.
- [6] 陈洁雯, 胡翼青. 从斯蒂芬森出发: 传播游戏理论的新进展[J]. 新闻春秋, 2019(6): 85.
- [7] 张卉妍. 北大人文课[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8: 23.
- [8] 侯旭. 论话语学“交往语境”范畴[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11).
- [9] 约翰·莱昂斯. 语义学: 下卷[M]. 沈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192.
- [10] 罗兰·米勒. 亲密关系[M]. 王伟平, 译. 8版.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 138.
- [11] 冯莉. 个体化时代城市青年的社会压力及其应对[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2): 88.
- [12] 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 张智勇, 乐国安, 侯玉波,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30.
- [13] 单波, 叶琼. 阅读《在一起孤独》: 网络社交自我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J]. 新闻大学, 2019(1): 53.
- [14] 邓晓芒. 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0.
- [15] 赵云泽, 张玲. 社交媒体中的数字情绪传播研究[J]. 当代传播, 2022(6): 26.
- [16] 乔纳森·布朗. 自我[M]. 王伟平, 陈浩莺,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48.
- [17] 阎云翔, 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 中国式亲密关系: 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7(7): 11.
- [18] 居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胡小跃,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51.
- [19] 曾国华. 重复性、创造力与数字时代的情感结构: 对短视频展演的“神经影像学”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27(5): 41.

责任编辑: 黄声波